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吴代龙^{1,2}, 刘利平²

(1. 巢湖学院 经济与法学学院, 安徽 合肥 238024; 2. 南京师范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出发点, 采用 2006—2020 年跨国服务贸易数据, 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实证分析内需扩大对服务贸易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1) 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促进服务贸易进出口, 且随着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 服务贸易出口的弹性系数增加。(2) 市场需求规模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弹性系数大于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弹性系数。尽管随着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 服务贸易进口和服务贸易出口都会增加, 但服务贸易逆差不会减少。(3) 不同于高端服务业, 低端服务业的进出口更容易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 具有较强的空间效应; 高法治环境相对于低法治环境更有利于对服务贸易进出口产生溢出效应。研究结论揭示了不同因素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影响差异, 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国际贸易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市场需求; 服务贸易; 空间溢出效应; 本土市场效应; 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752; F7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24)03-0034-11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世界经济的“服务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服务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引擎^[1]。加入 WTO 以来,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最初的 719 亿美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7 593.1 亿美元, 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分别占世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9.10% 和 3.81%。随着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 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自 1995 年起开始出现, 并呈现逐年扩大趋势。2018 年服务贸易逆差达到 2 91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2%, 远高于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 各国对国家、产业和价值链安全更为重视。后疫情时代以保障国家、产业安全为目的实施的贸易保护增多^[2], 导致世界经济形势疲软。虽然当前疫情态势已趋于稳定, 但对外经济贸易尚未完全恢复至疫情暴发前的水平^[3]。

疫情冲击下, 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面临的重大风险是来自发达国家日益严重的保护主义, 这种保护主义往往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出现。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下, 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剧, 产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4]。特别是国内外向型企业面临巨大发展压力, 新冠疫情造成的贸易限制也在减缓甚至逆转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增长^[5]。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实施技术封锁, 不仅遏制了全球价值链(GVC)的深度延伸, 不利于全球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 还会引发 GVC 分解与断裂^[6]。因此, 针对内外环境新变化, 必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延伸, 逐步扭转服务贸易逆差, 实现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 2024-01-06; 修回日期: 2024-04-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化赋能制造业质量效益提升机理与对策研究”(22BGL014)

作者简介: 吴代龙(1982—), 男, 江苏徐州人, 巢湖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讲师,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和企业管理; 刘利平(1981—), 男, 湖南衡阳人,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和运营管理。

从国际来看,欧美“再工业化”政策导致GVC分工趋于减速放缓,逆全球化潮流导致全球贸易减速。从国内来看,中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外生比较优势不可持续,基于本地市场效应的内生比较优势尚未确立,出口增长逐渐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常态化增长。在扩大内需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国际市场需求对中国贸易仍存在较大影响。事实上,服务贸易进出口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根据Krugman^[7]的观点,现实世界的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会影响国家内部市场的稳定与扩展。这种内需市场的扩大有助于提升国内出口水平,产生本地市场效应。扩大内需能直接吸引服务贸易进口,从而发挥服务贸易进口的技术和知识外溢效应,激发经济增长潜力^[8]。因此,如何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开创经济发展新动能,克服贸易壁垒,扭转服务贸易逆差,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难题。

二、文献回顾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有三类。第一类文献聚焦双边服务贸易研究。Bergstrand^[9]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可以降低远程交易成本,促进世界范围内服务贸易的发展。Grünfeld and Moxnes^[10]研究表明,区域一体化对服务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Guillin^[11]同样发现区域一体化可以促进服务贸易,但距离因素与服务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姚星等^[12]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Walsh^[13]研究发现,基于服务贸易总额和细分服务贸易的GDP和两个贸易国的共同语言对服务贸易规模有显著影响。Kandilov and Grennes^[14]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进行比较后指出,在服务贸易中距离的作用大于货物贸易,并进一步阐述了包括经济规模和技术进步在内的多种因素对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影响效应。

第二类文献侧重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研究。就影响中国服务贸易的因素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GDP和空间距离,例如单文婷和杨捷^[15]等的研究。二是外商直接投资(FDI)。FDI在服务行业中的流入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尤其是金融服务部门,不仅直接推动了服务部门的产出,还通过制造业部门产生了间接效应^[16]。Wong *et al.*^[17]的经验表明,FDI与服务贸易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反映了相对开放的外国投资政策和自由贸易体制对服务贸易有积极作用。三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徐元国^[18]强调,为实现服务贸易的长远健康发展,政府应从司法角度加强对服务贸易的监管。

第三类文献是关于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治理的研究。全球经济治理在危机中表现出的缺陷在于全球规则体系的缺失和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课题。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提高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19],因此,需要增强国力并进一步扩大开放,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更适应参与制订全球贸易治理规则的需求。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不仅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困境,也预示了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挑战。逆全球化背景与疫情的负面效果叠加,使得经济全球化雪上加霜,给全球贸易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20]。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使得对全球贡献不断增多的新兴国家被边缘化,透露出原有的治理体系已经无法体现新兴经济体的诉求^[21]。虽然新兴国家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意愿和能力有所增强,但这些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决策权和话语权依然被压制着^[22]。因此,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治理必须平衡好公共卫生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23]。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本文认为,在考虑国家间服务贸易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对内需扩大与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是必要的。本文尝试做以下两点探究:第一,对比内需扩大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系数与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系数的大小关系。第二,从实证层面考虑国家间服务贸易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来说,首先,从扩大内需角度研究其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影响,结合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国家间的交互作用越来越显著。考虑到国家间服务贸易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在对普通面板模型回归分析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从空间维度深入分析扩大内需能否改善服务贸易逆差。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 模型设定

衡量空间相关性的度量标准是莫兰指数(Moran's I),这一指数主要用来解释空间相邻区域单位属性的相似程度。莫兰指数的计算方式为:

$$I = \frac{n}{\sum_i \sum_j \omega_{ij}} \times \frac{\sum_i \sum_j \omega_{ij} (x_i - \bar{x})(x_j - \bar{x})}{\sum_i (x_i - \bar{x})^2} \quad (1)$$

其中 ω 是一个 $n \times n$ 阶的空间权重矩阵。

对于公式(1),可以用标准化统计量 Z 来检验空间自相关的存在,其计算公式为:

$$Z = \frac{I - E(I)}{\sqrt{Var(I)}} \quad (2)$$

当 Z 值为正且显著即对应 $I \in (0, 1]$ 时,表明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空间上相邻国家的服务出口(进口)值高;当 Z 值为负且显著即对应 $I \in [-1, 0)$ 时,表明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空间上相邻国家的服务出口(进口)高值与低值相邻;当 Z 值为零即对应 $I = 0$ 时,则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效应,观察值服从独立随机分布。

接下来,本文基于引力模型的基本思路考察国内市场规模对一国服务贸易的影响,构建以下模型:

$$\ln ex_{ijt} = \beta_0 + \beta_1 \ln gdp_{it} + \beta_2 \ln wgdpt + \beta_3 \ln wex_{ijt} + \beta_4 \ln dis_{ij} + \beta_5 spr_{it} + \beta_6 oecd + \beta_7 nafta + \beta_8 pop_{it} + \beta_9 bor_{ij} + \varepsilon_{ijt} \quad (3)$$

$$\ln im_{ijt} = \beta_0 + \beta_1 \ln gdp_{it} + \beta_2 \ln wgdpt + \beta_3 \ln wim_{ijt} + \beta_4 \ln dis_{ij} + \beta_5 spr_{it} + \beta_6 oecd + \beta_7 nafta + \beta_8 pop_{it} + \beta_9 bor_{ij} + \varepsilon_{ijt} \quad (4)$$

其中 i 是服务出口国, j 是服务进口国 (i 和 j 设定为 $1 \sim 24$), t 是年份 (t 设定为 $1 \sim 13$)。 $\ln ex_{ijt}$ 表示从 i 国到 j 国的出口值的自然对数; $\ln im_{ijt}$ 表示从 i 国到 j 国的进口值的自然对数; $\ln gdp_{it}$ 是取对数后的出口国 GDP, 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 $\ln wgdpt$ 是取对数后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ln wex_{ijt}$ 表示地域权重的自然对数与 i 国对 j 国服务出口额的乘积; $\ln wim_{ijt}$ 表示地域权重的自然对数与 i 国对 j 国服务进口额的乘积。 spr_{it} 指的是一国司法系统的完整性,代表该国的法治水平,包括法律结构和产权; $\ln dis_{ij}$ 表示从出口国 i 到进口国 j 距离的对数(距离是指各贸易伙伴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在上式中加入控制变量,即共同贸易区($oecd$ 、 $nafta$)、共同语言(lan)、总人口(pop)、共同边界(bor); ε_{ijt} 表示随机扰动项。

禀赋不同、技术水平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会表现出不同的进出口市场特征。为了更全面地分析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分别从服务贸易进口和服务贸易出口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将基础回归模型设为公式(5)和(6):

$$\ln ex_{ijt} = \alpha_0 + \alpha_1 \ln gdp_{it} + \alpha_2 \ln wgdpt + \alpha_3 \ln dis_{ij} + \alpha_4 spr_{it} + \alpha_5 lan_{ij} + \alpha_6 oecd + \alpha_7 nafta + \alpha_8 pop_{it} + \alpha_9 bor_{ij} + \varepsilon_{ijt} \quad (5)$$

$$\ln im_{ijt} = \alpha_0 + \alpha_1 \ln gdp_{it} + \alpha_2 \ln wgdpt + \alpha_3 \ln dis_{ij} + \alpha_4 spr_{it} + \alpha_5 lan_{ij} + \alpha_6 oecd + \alpha_7 nafta + \alpha_8 pop_{it} + \alpha_9 bor_{ij} + \varepsilon_{ijt} \quad (6)$$

最后,本文分别利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模型)对空间测量模型进行分解。本文设置的SAR模型为公式(7)和(8),SEM模型为公式(9)和(10)。

$$\ln ex_{ijt} = \rho wex_{ijt} + \alpha_1 \ln gdp_{it} + \alpha_2 \ln wgdpt + \alpha_3 \ln dis_{ij} + \alpha_4 spr_{it} + \alpha_5 oecd + \alpha_6 nafta + \alpha_7 pop_{it} + \alpha_8 bor_{ij} + \varepsilon_{ijt} \quad (7)$$

$$\ln im_{ijt} = \rho wim_{ijt} + \alpha_1 \ln gdp_{it} + \alpha_2 \ln wgdpt + \alpha_3 \ln dis_{ij} + \alpha_4 spr_{it} + \alpha_5 oecd + \alpha_6 nafta + \alpha_7 pop_{it} + \alpha_8 bor_{ij} + \varepsilon_{ijt} \quad (8)$$

$$\ln ex_{ijt} = \alpha_1 \ln gdp_{it} + \alpha_2 \ln wgdpt + \alpha_3 \ln dis_{ij} + \alpha_4 spr_{it} + \alpha_5 oecd + \alpha_6 nafta + \alpha_7 pop_{it} + \alpha_8 bor_{ij} + \varepsilon_{ijt} \quad (9)$$

$$\ln im_{ij} = \alpha_1 \ln gdp_{it} + \alpha_2 \ln wgd_{ij} + \alpha_3 \ln dis_{ij} + \alpha_4 spr_{it} + \alpha_5 oecd + \alpha_6 nafta + \alpha_7 pop_{it} + \alpha_8 bor_{ij} + \varepsilon_{ijt} \quad (10)$$

(二) 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了 2006—2020 年 23 个 OECD 国家与中国的服务贸易数据进行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弗雷泽研究所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EFW 指数)数据库、经合组织统计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①。

被解释变量:(1) 服务贸易出口(*ex*),一国出口到其他 23 个国家的服务贸易值,取对数后的最大值为 13.17,最小值为 6.56。(2) 服务贸易进口(*im*),一国从其他 23 个国家的服务贸易进口额,取对数后的最大值为 12.31,最小值为 6.64。

主要解释变量:(1) 需求规模(*gdp*)。本文用国内生产总值来反映一个国家的内需规模,取对数后的最大值为 17.13,最小值为 10.62。本文中的 *wgdp* 是全球 GDP 总量,其均值为 17.56。(2) 距离变量(*dis*)^②。本文用一国与其他 23 国的平均距离来表示距离变量,其对数均值为 8.35。距离代表贸易成本,距离越大,说明双边贸易量越小,存在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的一般情况下,两国距离与两国之间的出口或进口贸易额存在着反向关系。(3) 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spr*)。它是表示国家政体指数的离散变量,其值范围为 1~10,值越大,说明制度设计越好。进口国健康的进口环境离不开合理的制度设计,合理的体制机制设计能够有效减弱非关税壁垒,降低人为寻租壁垒,推动健康进口环境的构建,最终增加贸易进口量。

其他控制变量:(1) 共同贸易区(*oecd*、*nafta*)为虚拟变量,考察通过加入经合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予贸易双方一系列优惠条件,能否促进协议国家之间服务贸易发展。(2) 共同语言(*lan*)是一个虚拟变量,用来表示服务进口国和服务出口国是否使用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取 1,不同的取 0。(3) 总人口(*pop*)代表出口国的总人口(百万),反映了出口贸易市场的规模。出口国人口规模决定了其潜在出口规模与双边贸易流量,三者存在正相关关系。(4) 共同边界(*bor*)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出口国和进口国是否有共同的地理边界,如果有则为 1,否则为 0。作为双边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共同边界能够间接降低服务进出口贸易成本,增加贸易双方服务贸易进出口量。

四、需求变动与双边贸易的结果分析

(一) 基于出口角度的考察

表 1 考察了各变量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列(1)至列(4)为普通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第(5)列为三阶段普通最小二乘的回归结果,与第(4)列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结果稳健。根据表 1,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是一国服务出口最重要的驱动力。一个国家的 GDP 规模增加 1%,会使该国的服务贸易出口上升约 0.873%。这表明,中国扩大内需战略通过“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s)^③带动了国内进出口的增加。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一方面要重视和利用我国巨大的市场,大力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必须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方便国外居民消费,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外溢效应”,从而拉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提升服务出口的竞争力,优化出口贸易模式,为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服务出口受贸易国之间的距离制约。在相邻贸易国的情况下,服务贸易出口明显较高,因此,相邻边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更加频繁。根据表 1 第(4)列的结果,贸易国之间的距离每增加 1%,服务贸易出口就减少 0.721%。服务业的不可分割性,即生产和消费不能同时发生、不可分割,决定了服务贸易出口无法获得商品出口的强大流动性。因此,我国要走出服务贸易逆差困境,必须正确处理

①限于篇幅,未展示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备索。

②数据来源可参见 www.timeanddate.com。

③具体指,当一国国内消费增加时,其增加的消费商品中,一部分来自国内,一部分通过进口获得,这两部分均会增加供给,第一部分会促使厂家加大生产,第二部分会增加本国进口,即外国自主性出口增加,引起外国生产和就业的扩大,从而引起外国国民收入增加。这被称为本国国内需求变动对外国经济的“溢出效应”。

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不仅要加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往来,而且要坚持睦邻友好,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服务贸易。 spr 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即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可能会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这可能与制度运行成本过高有关。

第三,在两大自由贸易区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增加服务出口方面的作用最大,其成员资格对服务出口值的贡献率为1.197个百分点。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服务以及服务贸易将越来越重要,这与Francois and Reinert^[24]的观点一致。从人均收入来看,本文中的23个成员国早在2007年就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同时在经合组织内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和制造业的总和,因此可以看出经合组织对服务贸易出口的拉动作用如此之大。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不利于服务业出口的发展,其原因

在于本文的样本国家中只有美国和加拿大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而且由于地理和历史因素的影响,这两个国家的贸易隐性成本极高^[25],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结果所支持的解释。

(二) 基于进口角度的考察

上节详细分析了影响服务出口的因素,本节分析影响服务进口的因素。表2的列(1)至列(4)为普通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第(5)列为三阶段最小二乘的回归结果,与第(4)列的结果基本一致,研究结果依然稳健。实证结果中的Adj. R²值平稳上升,证明本文所选取的解释变量能够对服务贸易进口的特征进行合理的解释。将表2中的第(4)列作为服务贸易进口的估计值,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服务贸易进口市场中,一国GDP的作用大于世界GDP的作用。参照上一小节的结果,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影响双边服务贸易的因素中,国内GDP的作用高于世界GDP,经济增长带动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国民有能力消费高端服务,尤其是国外高端服务,且值得注意的是,国内GDP对服务贸易进口的拉动作用大约是世界GDP的两倍。进一步比较表1和表2中的第(4)列可以观察到,尽管国内市场的扩展能够同时促进服务贸易出口与进口,但其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刺激效应显著高于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具体而言,国内需求规模增加1%,会导致服务贸易出口增加0.873%,服务贸易进口增加0.935%。这表明,随着一国需求水平的提高,服务贸易进口将超过出口,导致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谭洪波和郑江淮^[26]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国内整体经济的增长,国内服务业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要。因此,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诱发了我国对其他国家服务消费需求的增加。鉴于此,扩大内需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服务贸易进口,但难以帮助我国改善服务贸易逆差的局面。

表1 服务贸易出口回归结果

变量	普通面板模型				三阶段最小二乘
	(1)	(2)	(3)	(4)	(5)
<i>lngdp</i>	0.778 *** (0.000)	0.735 *** (0.000)	0.836 *** (0.000)	0.873 *** (0.000)	0.812 *** (0.000)
<i>lnwgdg</i>		0.572 *** (0.000)	0.568 *** (0.000)	0.541 *** (0.000)	0.492 *** (0.000)
<i>spr</i>			-0.031 (0.150)	-0.048 (0.179)	-0.057 (0.162)
<i>lndis</i>				-0.721 *** (0.000)	0.243 (0.217)
<i>oecd</i>	0.813 * (0.061)	0.892 * (0.055)	0.872 * (0.053)	1.197 ** (0.014)	0.842 * (0.072)
<i>nafta</i>	-0.414 * (0.052)	-0.621 * (0.063)	-0.607 * (0.055)	-0.602 ** (0.012)	-0.372 * (0.071)
<i>lan</i>	-0.057 (0.513)	-0.054 (0.629)	-0.074 (0.710)	-0.062 (0.619)	-0.093 (0.526)
<i>pop</i>	0.515 ** (0.014)	0.541 ** (0.023)	0.437 ** (0.035)	0.520 ** (0.027)	0.561 ** (0.017)
<i>bor</i>	0.146 * (0.067)	0.085 (0.193)	0.172 * (0.079)	0.196 * (0.064)	0.159 * (0.070)
<i>constant</i>	-4.563 * (0.083)	-3.529 (0.190)	-4.734 ** (0.018)	-4.146 * (0.054)	-10.482 *** (0.000)
Wald 检验	762.14 [0.000]	731.70 [0.000]	751.79 [0.000]	736.18 [0.000]	770.42 [0.000]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360
Adj. R ²	0.510 1	0.470 2	0.491 0	0.502 1	0.483 2
Hausman 检验	0.310 7	0.331 7	0.340 6	0.371 9	0.000 3

注:普通面板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圆括号内为*p*值,方括号中是Wald检验的*p*值。

第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距离越大,服务贸易进口活动越少。表2的第(4)列给出了相应的结果,即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个百分点,服务贸易进口就会下降0.573个百分点。同时,距离对服务贸易进口的阻滞作用弱于服务贸易出口。也就是说,在存在地域阻力的情况下,服务贸易进口比服务贸易出口更容易得到开展。这一方面是由于一国的剩余劳动力流向低端服务生产部门,国际上对低端劳动密集型服务的需求量较低,使得服务贸易出口受阻;另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服务型企业受到服务固有的不可分割性影响,无法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因此服务贸易出口比服务贸易进口更难。

当国内贸易司法体系(*spr*)较完整时,服务进口的贸易量就会增加,进而通过“后发制人”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27]。此外,两个自由贸易区服务进口的实证结果与服务出口的实证结果大致相似。

五、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的空间溢出效应

(一) 空间相关性检验

利用距离权重矩阵^①得到的服务贸易出口水平与进口水平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所有的Moran's I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被拒绝了原假设,并且绝大多数年份的Moran's I统计量为正值,可以得出样本国家的服务出口(进口)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具体而言:2006年和2007年的莫兰指数为负值,说明空间相邻国家的服务贸易不具有相似性;2008年至2020年的莫兰指数均大于0,说明空间相邻国家的服务贸易呈正相关。

(二)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接下来,本文将利用Matlab R2023b软件对面板SAR模型和面板SEM模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奇数列列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值,偶数列列为固定效应的估计值。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方差

表2 服务贸易进口回归结果

变量	普通面板模型				三阶段最小二乘
	(1)	(2)	(3)	(4)	(5)
<i>lngdp</i>	0.823*** (0.000)	0.869*** (0.000)	0.847*** (0.000)	0.935*** (0.000)	0.846*** (0.001)
<i>lnwgdg</i>		0.463*** (0.000)	0.525*** (0.000)	0.474*** (0.000)	0.347*** (0.001)
<i>spr</i>			0.024 (0.439)	0.019 (0.824)	0.031 (0.573)
<i>lndis</i>				-0.573*** (0.000)	0.489 (0.283)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6.364** (0.023)	-5.913** (0.032)	-5.570** (0.030)	-5.829** (0.041)	-11.376*** (0.000)
Wald 检验	856.36 [0.000]	838.02 [0.000]	858.93 [0.000]	874.579 [0.000]	845.39 [0.000]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360
Adj. R ²	0.5083	0.5426	0.5515	0.6120	0.6041
Hausman 检验	0.0015	0.0012	0.0025	0.0031	0.0001

注:普通面板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圆括号内为*p*值,方括号中是Wald检验的*p*值。限于篇幅,未展示控制变量结果,备索。

表3 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年份	服务出口		服务进口	
	Moran's I	<i>z</i>	Moran's I	<i>z</i>
2006	-0.447***	-0.152	-0.383***	4.530
2007	-0.355***	1.024	-0.365***	3.462
2008	0.312***	7.020	0.399***	9.421
2009	0.338***	7.352	0.290***	9.291
2010	0.428***	7.218	0.309***	9.537
2011	0.457***	6.317	0.367***	10.286
2012	0.468***	6.449	0.316***	9.622
2013	0.425***	5.907	0.348***	10.034
2014	0.448***	6.191	0.416***	10.913
2015	0.505***	8.206	0.562***	12.781
2016	0.533***	6.010	0.355***	10.165
2017	0.610***	6.988	0.512***	12.138
2018	0.614***	7.041	0.513***	12.158
2019	0.628***	6.445	0.578***	10.236
2020	0.631***	7.203	0.562***	11.98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①本文使用的是空间面板数据,基于距离的倒数构建出相应的空间权重矩阵。

系数的显著性,而不是通过比较以下 8 个模型来选择最佳模型,之所以列出多个模型的实证结果,是为了在多个模型之间进行印证。从空间模型检验结果和方差系数的显著性来看,空间模型的检验结果和方差系数均表现出高度显著性,说明数据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比正态面板更有说服力。

首先,一国的 GDP 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增强效应大于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增强效应。在 SAR 模型中,国内市场规模增加 1%,该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就会增加 0.813%;在 SAR 模型中,服务贸易进口的弹性为 0.902,即国内市场规模增加 1%,该国的服务进口就会增加 0.902%,显然 $0.902% > 0.813%$ 。从 SEM 模型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意味着,随着国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服务贸易进口与服务贸易出口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即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其次,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的负激励作用。在 SEM 模型中,距离对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进口的系数都为负,并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空间距离较远的国家间的贸易交易量较少,这证实了前文一般面板中结论的有效性。与 SEM 模型相反,SAR 模型中的距离系数对服务贸易有正向促进作用,但 SAR 模型中的距离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距离系数限制了服务贸易。值得一提的是,距离对服务贸易出口的阻碍作用大于服务贸易进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服务贸易出现逆差的原因。

表 4 服务进出口贸易的空间溢出与扩大内需关系的实证结果

变量	空间自回归模型(SAR)				空间误差模型(SEM)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1)	(2)	(3)	(4)	(5)	(6)	(7)	(8)
<i>lngdp</i>	0.813*** (0.000)	0.764*** (0.000)	0.902*** (0.000)	0.791*** (0.000)	0.762*** (0.000)	0.783*** (0.000)	0.832*** (0.000)	0.846*** (0.001)
<i>spr</i>	-0.047 (0.298)	-0.041 (0.174)	0.037 (0.502)	0.029 (0.422)	0.023 (0.393)	0.035 (0.554)	0.205** (0.017)	0.092** (0.031)
<i>lndis</i>	0.317 (0.293)	0.376 (0.501)	0.330 (0.399)	0.406 (0.492)	-0.698*** (0.000)	-0.535*** (0.000)	-0.516*** (0.000)	-0.630*** (0.000)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12.483*** (0.001)	-12.367*** (0.000)	-12.495*** (0.000)	-13.155*** (0.000)	-5.436 (0.456)	-6.015 (0.175)	-6.489** (0.042)	-6.820** (0.029)
ρ	6.251*** (0.007)		6.367** (0.020)		23.541*** (0.000)		25.678*** (0.001)	
λ		6.461*** (0.002)		6.582*** (0.003)		22.284*** (0.003)		25.473*** (0.000)
Log-L 检验	-93.256	-87.205	-77.357	-85.450	-86.346	-91.197	-72.606	-77.935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Adj. R ²	0.526	0.572	0.628	0.648	0.619	0.640	0.713	0.697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p 值。限于篇幅,未展示控制变量结果,备索。

最后,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作为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变量也得到了实证检验,法律制度的完善可以显著提高一国服务贸易进口的贸易额。SEM 模型中的随机效应显示,法治指数每增加 1%,服务进口量就会增加约 0.205%。与 SEM 模型不同的是,SAR 模型中的 *spr* 对服务贸易出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实证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 SAR 模型中的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不可信。

(三) 稳健性检验^①

产业空间的外溢效应不仅会受到城市间距离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为了检验数据分析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结合城市经济距离,构建社会经济特征的空间加权矩阵进行检验。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在空间自回归模型中,出口和进口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对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具有正向影响,这也出现在空间误差模型的估计结果中。此外 ρ 和 λ 均显著为正,表明在考虑经济地理距离时,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28],这一结果与表 4 一致,说明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六、异质性分析

(一) 行业异质性

考虑到不同的服务业进出口贸易与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在空间外溢关系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节对服务业进行细化,将其分为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两类。高端服务业通常分为智力化服务业、资本化服务业、专业化服务业和效率化服务业 4 大类,主要包括科研、教育、总部经济、金融、三四方物流、休闲旅游业、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咨询信息、创意设计、节庆、展会、IT 资讯、订单采购、商务活动、企业服务业(智力、资本、商务活动)、专业中介等 17 个方面,其他服务业则属于低端服务业。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低端服务业进口与出口的系数差值大于高端服务业的系数差值,说明市场需求扩大对低端服务业贸易逆差的影响较大,从而改善了贸易逆差地位。究其原因,可能是低端服务业扩大内需的空间外溢效应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较大,较容易受到距离的阻碍,而高端服务业不受地理距离的限制,更多受信息交流成本的影响。从服务进出口贸易的空间外溢结果可以看出,低端服务业的 ρ 和 λ 普遍高于高端服务业,这说明低端服务业进出口受相邻地区的影响更大,空间效应更强。

表 5 不同行业服务进出口贸易的空间溢出结果

变量	高端服务业				低端服务业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SAR (1)	SEM (2)	SAR (3)	SEM (4)	SAR (5)	SEM (6)	SAR (7)	SEM (8)
$\ln gdp$	0.874*** (0.000)	0.806*** (0.000)	0.862*** (0.000)	0.780*** (0.000)	0.903*** (0.000)	0.879*** (0.000)	0.715*** (0.000)	0.730*** (0.000)
spr	0.174*** (0.000)	0.136** (0.026)	0.119** (0.018)	0.035*** (0.000)	0.027*** (0.000)	0.051*** (0.003)	0.124*** (0.000)	0.156** (0.040)
$\ln dis$	0.215** (0.016)	0.278*** (0.000)	0.492** (0.035)	0.473 (0.264)	-0.756*** (0.000)	-0.725*** (0.000)	-0.642*** (0.000)	-0.633*** (0.000)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12.293*** (0.000)	-11.020*** (0.000)	-12.157*** (0.000)	-11.856*** (0.000)	-5.830 (0.573)	-5.285 (0.394)	-6.299** (0.032)	-6.679** (0.044)
ρ	6.538*** (0.000)		6.592** (0.032)		6.810*** (0.001)		6.694*** (0.000)	
λ		23.203*** (0.001)		24.391*** (0.000)		25.423*** (0.000)		25.098*** (0.001)
Log-L 检验	-87.293	-88.189	-79.694	-78.109	-82.198	-87.323	-75.957	-77.119
观测值	155	155	155	155	205	205	205	205
Adj. R ²	0.610	0.681	0.603	0.629	0.644	0.618	0.668	0.694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p 值。限于篇幅,未展示控制变量结果,备索。

^①限于篇幅,未展示稳健性检验结果,备索。

(二) 法治水平异质性

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刺激服务贸易出口,同时增加服务贸易进口,因此,法治水平的差异间接影响出口国内需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那么不同的法治水平是否影响服务进出口贸易的空间效应呢?根据法律结构和产权保护(*spr*)的计算结果,大于5为高法治水平国家,否则为低法治水平国家。结果如表6所示。

首先,低法治国家的 $\ln gdp$ 系数均小于表4,而高法治国家则相反,表明法治有助于激励服务贸易,与上述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前文的实证结果。其次,低法治国家的进口与出口的 $\ln gdp$ 系数差异大于高法治国家,表明司法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改善服务贸易逆差。最后,从服务贸易的空间效应结果可以看出,高法治国家的 ρ 和 λ 普遍高于低法治国家。这说明高法治环境更有利于发挥服务贸易对进出口的溢出效应,一个国家较高的法治水平、良好的司法体系和执行合同的能力能够加强区域间的信任,减少交易摩擦,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区域间的联系。

表6 东道国法治水平异质性检验

变量	高法治水平				低法治水平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SAR (1)	SEM (2)	SAR (3)	SEM (4)	SAR (5)	SEM (6)	SAR (7)	SEM (8)
$\ln gdp$	0.929*** (0.000)	0.895*** (0.000)	0.917*** (0.000)	0.867*** (0.001)	0.715*** (0.000)	0.739*** (0.000)	0.624*** (0.000)	0.610*** (0.000)
<i>spr</i>	0.128*** (0.000)	0.149** (0.023)	0.151*** (0.001)	0.037*** (0.000)	0.014*** (0.000)	0.032*** (0.001)	0.043*** (0.000)	0.092** (0.023)
$\ln dis$	0.193*** (0.000)	0.247** (0.046)	0.328** (0.032)	0.363 (0.420)	-0.678** (0.017)	-0.724*** (0.000)	-0.636*** (0.000)	-0.520*** (0.000)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tant</i>	-13.892*** (0.000)	-12.301*** (0.000)	-11.749*** (0.000)	-11.408*** (0.000)	-4.724 (0.190)	-5.598 (0.592)	-5.883** (0.032)	-6.309*** (0.003)
ρ	6.402*** (0.000)		6.369*** (0.001)		6.317*** (0.000)		5.971*** (0.000)	
λ		25.475*** (0.000)		25.363** (0.021)		24.966*** (0.001)		25.014*** (0.000)
Log-L 检验	-88.349	-90.502	-80.485	-77.103	-80.394	-86.429	-71.258	-69.569
观测值	135	135	135	135	225	225	225	225
Adj. R ²	0.667	0.629	0.640	0.688	0.613	0.642	0.651	0.607

注:***、**和*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p*值。限于篇幅,未展示控制变量结果,备索。

七、结论与建议

随着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趋势的加大,服务贸易进口问题日趋严重,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正确处理服务贸易进口问题对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大意义。平衡好内需与服务贸易进口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所在。扩大内需是否有利于缓解服务进出口逆差?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的角度,本文利用2006—2020年跨国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讨论了需求规模对服务贸易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对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均具有正向影响,但未能缓解服务贸易逆差。该结论经过广义最小二乘法、空间效应模型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第二,与高端服务业的进出口相比,低端服务业的进出口受到相邻地区的影响更大,空间效应更强。同时,与低法治环境相比,高法治环境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强。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 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实证

结果表明,扩大内需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具有正外部性,国内需求规模增加1%,使得服务贸易出口增加0.873%。为适应中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形势和任务,政府应继续发挥好政策引导作用,从全局出发,高度认识到扩大服务内需的重要性,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面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应积极完善国内价值链以应对外部风险,从而在“逆全球化”浪潮中获得相对竞争优势。这一研究结果对缓解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现状、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2) 充分利用国家领导人会议和国际会议,启动和实施各自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治理。本文发现,OECD成员资格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成员国内部服务业发展较为成熟,组织内贸易壁垒较低,成员国能够共享政策优惠。因此,我国应利用自身地缘优势,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构建跨境自贸区等形式推动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加强进出口国之间在法律和政治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利契机,更好地推进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着力加强与沿线各国的双边及多边区域合作,为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需要积极倡导各国重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建立适应后疫情时代要求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

(3) 慎重选择服务贸易出口的地点,寻找合适对外贸易对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法治水平对服务进出口贸易的空间影响效应不同,相对于低法治国家,高法治国家服务贸易逆差较小,更能够发挥服务贸易对进出口的溢出效应。为此,服务贸易出口企业应考虑贸易伙伴国在制度环境、文化、语言、地理位置和法律完善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制度质量不高或与本国制度差距较大的进口国,有必要通过签订相关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扩大服务贸易的市场范围。

(4) 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中,我国需要聚焦于提升服务产业核心竞争力,精准定向发力,瞄准全球产业链发展趋势和科技创新动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联动发展,以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此外,中国还需要准确把握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动态和规律,有效应对问题和挑战,积极提出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战略和政策。

今后的研究可以按照以下几个方向进行:(1) 扩大分析样本范围,尝试以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国家等为例,考察国内需求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的一般性;(2) 以空间溢出效应为研究重点,借助典型案例分析法,讨论区域经济体对服务贸易进口的作用机制,为政府调整和优化国家内需战略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依据;(3) 拓展分析视角,从动态比较优势出发,探究产业链供应链延伸视角下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 [1] 鲁慧鑫, 郭根龙, 冯宗宪. 服务贸易限制、制度质量与国家经济增长[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5(2): 45-57.
- [2] 唐宜红, 张鹏杨. 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策略[J]. 国际贸易, 2020(11): 4-10.
- [3] 邢秀凤, 张雪莹, 徐梦凡. 双循环战略下新冠疫情对内循环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区市的经验证据[J]. 工业技术经济, 2021, 40(8): 118-125.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2): 80-97.
- [5] 张享明, 伍圆圆. 后疫情时代就业公共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策略[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9(6): 12-18.
- [6] 高运胜, 李之旭, 朱佳纯. 贸易失衡引致了“逆全球化”吗——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9): 1-16.
- [7] 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5): 950-959.

- [8]陈健 赵迪 郑丹青. 中国服务贸易进口下的知识外溢效应研究——外溢结构分解下的探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6): 82-91.
- [9]BERGSTRAND J H. The generalized gravity equation,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the factor-proportion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9 71(1): 143-153.
- [10]GRÜNFELD L A, MOXNES A. The intangible globalization: explaining the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R].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aper, 2003.
- [11]GUILLIN A. Comparison between FDI motivations in goods and services[J]. Economics bulletin, 2011, 31(4): 2744-2756.
- [12]姚星 王博 王磊. 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产业支撑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因素[J]. 财贸经济 2021 42(3): 145-160.
- [13]WALSH K. Trade in services: does gravity hold? A gravity model approach to estimating barriers to services trade [R]. IIS discussion paper, No. 183 2006.
- [14]KANDILOV I, GRENNES T. The determinants of service offshoring: does distance matter [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2012, 24(1): 36-43.
- [15]单文婷 杨捷. 引力模型在中国与东盟贸易中的实证分析[J]. 亚太经济 2006(6): 16-19 + 11.
- [16]DOYTCH N, UCTUM M.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 evidence at sub-sectoral level for the Asia-Pacific [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9, 60: 33-44.
- [17]WONG K N, TANG T C, FAUSTEN D 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ervices trade: evidence from Malaysia and Singapore [J]. Global economic review, 2009, 38(3): 265-276.
- [18]徐元国. 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规制的比较分析与启示[J]. 国际贸易问题 2005(6): 95-99.
- [19]裴长洪. 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J]. 经济研究 2014 49(3): 4-19.
-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十四五”时期推进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方法与对策[J]. 财贸经济, 2021 42(10): 21-35.
- [21]刘伟 王文.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J]. 管理世界 2019 35(3): 1-16.
- [22]石晨霞.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J]. 东北亚论坛 2016 25(4): 108-118 + 128.
- [23]宁红玲. 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治理的困境与路径——基于 WHO 和 WTO 的考察 [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1 36(1): 60-67.
- [24]FRANCOIS J, REINERT K. The role of services in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stylized facts from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J]. Asia-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996, 2(1): 35-43.
- [25]HUMMELS D. Have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costs declined?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54: 75-96.
- [26]谭洪波 郑江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后并存之谜——基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9): 5-17.
- [27]陈启斐, 王晶晶, 岳中刚. 扩大内需战略能否扭转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来自我国和 23 个 OECD 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2): 86-95.
- [28]苏二豆 薛军. 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企业出口 [J]. 产业经济研究 2020(2): 1-15.

(责任编辑:孔群喜;英文校对:谈书墨)

(下转第 65 页)

- [32]温忠麟,陈虹熹,方杰,等.新世纪20年国内测验信度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22,30(8):1682-1691.
- [33]方杰,温忠麟,梁东梅,等.基于多元回归的调节效应分析[J].心理科学,2015,38(3):715-720.
- [34]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35]GONG Y P, HUANG J C, FARH J L. Employee learning orienta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creative self-effica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52(4): 765-778.
- [36]丁焕峰,张蕊,周锐波.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及其创新效应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J].产业经济研究,2023(2):83-96.
- [37]付景涛,刘路瑶,张靓婷.放任型领导影响员工工作重塑的双刃剑效应[J].管理学报,2022,19(5):666-675.
- (责任编辑:原小能;英文校对:谈书墨)

How Job Creativity Requirements Affect Employee Creativity? A Job Crafting Perspective

MA Yingshuang¹, ZHANG Haomin²

(1. Business School,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438000,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creativity requirement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is a theme explored in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for this effect is a popular topic for organizational scholars and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Based on the job requirements-resource model and goal-setting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job creativity requirement impacts employee creativity. An analysis of 435 paired questionnaires shows that the requirement positively affects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this relationship is partly mediated by job crafting; servant leadership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creativity requirement and job crafting.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by which job creativity requirement impacts employee creativity. It also provides beneficial guidance for management to enhance employees' creativity from three aspects: actively guiding employees to recognize the job creativity requirement, encouraging employee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carry out job crafting according to work needs, and training team managers to pursue a service-oriented leadership style.

Key words: job creativity requirement; job crafting; servant leadership; employee creativity

(上接第44页)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

WU Dailong^{1,2}, LIU Lipi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Chaohu University, Hefei 238024,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s a starting point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on services trade by establishing a spatial panel data model using cross-country services trade data from 2006 to 2020.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creased market demand promotes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services, and th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service exports increases with the scale of market demand. Further, the elasticity of service import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service exports, and although service imports and exports both increase as market demand expands, the service-trade deficit does not decrease. In addition, compared to high-end services,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low-end servic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neighboring regions and have strong spatial effects;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rule of law is strong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spillover on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services trade than an environment where it is weak. The findings reveal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services, providing a valuable reference point for policymaking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ecision-making.

Key words: market demand; service trad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local market effect; heterogeneity